

何谓“服饰”？按照现代汉语的释义，服饰者，“衣着和装饰”之谓也，古代常以“衣”“服”“衣裳”“衣服”和“衣冠”等称之。也就是说，“服饰”一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狭义，指的是衣服、衣着或服装；其广义，则包括衣服之外的其他与衣服直接相关的装饰以及与美化身体有关的装饰，如古人曾有将冠、笄、带、裳、履称之为“五服”者。服装与其装饰以及人体装饰密切相关，并且许多情况下是相互搭配、交相辉映，如“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续汉书·舆服志》）等，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研究的实践中，取“服饰”之广义是必要的。当然，服饰的核心和主体是服装（既包括上衣和内衣、内衣和外套，也包括首服和足衣等），因此也必然成为研究的重点，但将发型、发饰等纳入服饰研究的视野，也是必要的。至于人体装饰品——日语中称之为“装身具”，如头饰、耳饰、项饰、胸饰、腰饰、带具、带饰、臂饰、腕饰、指环或戒指、踝饰、足饰等，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系统性，因此，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进行研究也是可行的。

人从动物界演化而来，是通过漫长的劳动而完成的，因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语）。随着人类的诞生，服饰也随之而生。尽管最初的服饰极为简单原始，可能是一块禽兽之毛皮，也可能是连缀在一起的几块树皮或树叶，即“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礼记·礼运篇》），或“衣皮毛”、“衣皮革”（《白虎通义·号篇》），或“衣毛而冒皮”（《续汉书·舆服志》），但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防避寒暑、祛除蚊虫等物质属性，同时又具备别男女、遮体羞、美外形等精神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与动物界的区别是什么？是衣服，是服饰！人类历史进入文明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服饰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逐步发展、演进和复杂化的同时，又出现了社会属性并逐步得到强化——服饰成为贫富差别的标识之一、社会地位高低的标识之一、等级差别的标识之一、权力大小的标识之一、族群认同的标识之一、分工共同体意识的标识之一、职业分工的标识之一等等，服饰与整个人类历史尤其是人类文明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服饰本身是物质的，但它作为服饰文化的物质载体，其物质形态的变化是服饰文化变迁的“指示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演进的“指示器”。正因为如此，古代服饰及服饰文化研究绝不仅仅是古代物质文化的研究，而是人类历史尤其是人类文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古代服饰研究无疑是我国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

毋庸讳言，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上的服饰都需要考古学研究，但不同历史阶段服饰考古的重点和意义有所不同。就东周秦汉时期的服饰来说，既是我国古代服饰的一个大转折、大发展时期，更是服饰文化由多元真正走向一体的关键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因为，东周秦汉时期，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以蚕丝和苧麻、大麻、葛等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纺织业获得空前发展，为服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东周时期的四百年间，既是诸侯国林立、列国争霸的大动荡时期，也是学术大争鸣、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的时期，更是社会政治从王国时代走向帝国时代的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秦汉时期的四百年间，伴随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真正形成。因此，对东周秦汉时期近千年的服饰进行系统的考古学研究，不仅可以全面揭示东周时期复杂多样的服饰文化面貌，而且可以揭示秦汉时期服饰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演进轨迹，描绘汉服——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之根——生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图景，更有助于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探究和阐释。这也正是《汉服的形成》之选题和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

正是基于对服饰考古性质和任务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对东周秦汉服饰考古之时代特点和学术目标的把握，《汉服的形成》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些成果及其学术贡献或可大致归纳为以下诸方面。

其一，对迄今考古发现的东周秦汉时期的服饰资料——既包括服饰实物资料，也包括服饰形象资料和简牍文字资料等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分类整理，不仅使本书的研究具有丰富、翔实、扎实的资料基础，体现出“论从史出”的优良治学方法，而且为学界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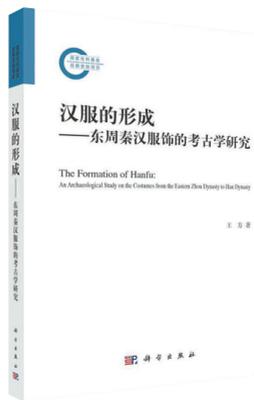
其二，通过各种服饰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并与文献史料有机结合，对东周和秦汉时期的主要服饰类型——上衣、下衣、足衣、首服与发型，以及服装的质料、纹饰和色彩等，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结合“名物”考证，初步从考古学上揭示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服饰样貌及其特征，可谓当时服饰文化的全景式描绘，尽管这种描绘因资料所限大多还是“点状的”。

其三，基于对东周列国服饰的细致的类型学考察，对东周时期服饰的多元体系和二元格局，以及东周服饰的时代性符号——深衣体系的形成进行考古学解构和理论性概括，进一步深化了对东周服饰体系和服饰文化总体特征及其演变的认识。

东周秦汉服饰考古研究的新成果

——读《汉服的形成》

白云翔



其四，基于秦汉王朝中央统治区和西南及西北地区服饰类型及其特征的全面梳理和宏观考察，不仅揭示了当时汉民族的服饰文化面貌及其发展演变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人服饰文化传统及其特点，而且初步构建起秦汉时期服饰文化从西汉早期的多元格局、历经西汉中期的趋同化发展再到西汉晚期及东汉时期稳定化发展的“三段式”演进模式。这实际上也是从服饰文化的视角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秦汉时期真正形成进行的深入阐释。

其五，基于上述各方面的分析和考察，初步厘清了汉服（狭义上专指汉代服饰）以东周时期深衣的样式为基础到西汉中期形成具有统一风格和全新服饰面貌的汉服的形成过程，勾画出了东周秦汉近千年间服饰文化的演进轨迹，从考古学上揭示了“汉服的形成”及其社会历史和文化动因。王方在书中指出，“汉服的形成和发展一直是在不断交流中兼容并蓄各种服饰元素实现着自身的巩固、完善和发展”，“汉服已非单纯的服饰类型或是对某些具有共同款式特征的服饰类型的统称，而是汉家礼仪的重要内容，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标识”，并且“奠定了华夏服饰体系的形态基础”。这些理论性概括，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服热”持续高涨的今天，对于科学理解和认识“汉服”以及华夏服饰体系，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其六，关于服饰文化和服饰考古的理论思考和探讨。基于东周秦汉服饰考古学研究的实践，该书对服饰文化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服饰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意识、审美观念、宗教信仰、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格局等的内在联系等；与此同时，就服饰考古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和阐述，如服饰考古的学科定位、研究路径、基本任务和最终目标、服饰考古材料的科学性和局限性等问题，服饰考古与服饰史研究的异同及相互关系等。凡种种思考及其认识，尽管大都是初步的，还需要不断深化和完善，但它们是作者在研究实践中的切身体会和感悟，有些是颇有见地的，对于今后的服饰文化研究和服饰考古及其学科建设，都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要之，《汉服的形成》无论是考古材料以及文献史料的收集、梳理和解读，还是基于考古资料和考古学方法与文献史料有机结合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范式 and 阐释逻辑，无论是各种类型服饰样貌的复原还是服饰体系的构建、服饰文化的解构乃至有关服饰文化研究和服饰考古的理论思考和探讨，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对“汉服的形成”做出了初步的考古学回答和书写。这既是东周秦汉服饰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服饰考古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当然，该书毕竟是东周秦汉服饰考古的阶段性成果，囿于考古资料以及作者精力和积累的局限等，从服饰考古的总体要求来说，书中也还多有缺憾。譬如，将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尤其是出土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名物考证作为服饰物质形态研究的基础作业之一，有待进一步加强；以服饰的物质形态研究为基础，服饰之精神属性和精神内涵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坚持以考古资料和考古学方法为本研究服饰的同时，将服饰考古成果融入或服务于整体的考古学研究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实践；对服饰之“时代性”和“统一性”进行归纳总结和宏观叙述的同时，对其地域性、季节性、职业性、应用场景和阶层差异等给予足够的关注也是必要的。很显然，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尤其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无论如何，《汉服的形成》标志着方在服饰考古上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并且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范式，只要沿着这条路子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取得新的学术成果、做出新的学术贡献，未来可期。

就服饰考古而言，它作为现代考古学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学科建设上既需要理论的探索，更需要研究的实践。因为，实践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唯一源泉。或许有学者认为服饰考古只不过是古代物质文化研究——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在有的学者看来，服饰考古不是什么宏大叙事而仅仅是形而下的“小学”而已，但服饰及服饰文化研究在人类文明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也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在全面解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更是显而易见。令人欣喜的是，已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加入到了服饰考古的研究队伍中来，如2015年分别出版的徐蕊同志和郑春颖同志的博士论文《汉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和《高句丽服饰研究》，都是古代服饰断代考古研究的佳作，显示出服饰考古充满了活力、具有广阔的学术和文化前景。我深信，服饰考古必将在中华服饰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史研究中书写浓墨重彩的篇章。

（本文摘自《汉服的形成》序言部分）

《汉服的形成》

作者：王方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唐代中国作为亚欧大陆上的中央国家，曾大量接受西域文化的“胡风”和南亚佛教的“梵风”，又把自己成熟的“唐风”文化大量送往东海之遥的日本、朝鲜，所以国都长安就是这座桥梁的桥头堡，既是连接西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延长东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东去西来，左右链接，八面来风。

曾在丝绸之路上流传着被西方人称为“胡姆丹”（Khumdan）的长安，究竟是叙利亚语、阿拉伯语还是波斯语、粟特语，至今说法种种仍是无解之谜，但是长安见证了无数胡商、番贾、梵僧、使节、质子，将士、留学生从不同国度冒着重重险阻往来西域与中原之间，穿梭于岭南海港与京城之间，他们沿着汉魏开辟的丝绸之路继续拓展中国与外域的路网，从而使最初东西方连接的贸易丝带变成了一条条文明的纽带。

西安博物院把千年来凝固了这座城市记忆与感怀的文物一一保存，并呈现给热爱这座城市的人和外国朋友，连续举办了几个关于长安的大展，这种文化使命感无疑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因为文物无可替代。特别是有一些有关丝绸之路的藏品十分引人注目，历经岁月的流逝，这些具有独家性、唯一性、稀缺性的文物愈显珍贵，堪称长安城市文化编年史的一部分，从这些文物藏品中可以真切感受到那些“长安与世界”息息相关的历史，既有人物的品性，又有地域的文采，还有种族的气质，以及咏物的情致。

这次策展团队以西安博物院收藏的标志性唐三彩文物“异域少年”骑马腾空奔驰造型为引路物，串联相关的文物组成了原创展览“长安有故里——丝路少年大唐行”。展览主角是个穿蓝色胡服的英俊少年，这个少年从种族上观察无疑是外来的样貌，而是究统地冠以“丝路少年”释读解决了长安这座胡汉、蕃汉融合城市的真实状况，展现中古的长安城像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像丝路少年这样的人争相进入这座伟大的都城，甚至流连忘返于此乐不思返，以此演绎遥远的长安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之城。

展览线路伴随着这位穿蓝衣的“丝路少年”快马放缰“一日看尽长安花”，用尖锐敏感的智慧眼光一览昔日的盛唐时光，共同回顾一段长安的历史，体悟曾经的文明辉煌，更能理解丝绸之路曾经带来的繁荣，开放、包容、交流永远是一个国家充满活力的基本因素。

在第一场景中，展览以“市”亮相，将“商”与“肆”通过经营广泛的“西市胡”领入观众眼前，这些西市胡举凡珠宝、绢帛、药材、举货、邸店、饮食等均有涉及，出土的三彩凤首壶、八曲缠枝纹银碗、白釉叶纹扁壶、白瓷皮囊形壶、瑞兽葡萄镜、螺钿花鸟镜等器物，衬托着造型各异的胡人俑，似乎激活了千姿百态的人物，使久远的陶俑、三彩俑有了呼吸，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整个场景里还涉及胡服胡饰、胡饮胡食、胡音胡乐，更增添了外来文化的底色，也确立了长安国际都市的坐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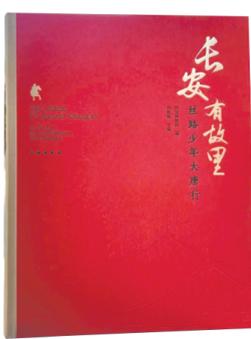
在第二场景中，围绕长安的“寺”，讲述“茶”与“戏”，不仅寺院禅房外花木静深，而且茶堂青烟袅袅，呈现出饮茶社会风俗越来越兴盛的局面，展览陈列出一批精致的茶具，不仅表示茶器从一般器盘中分离出来，而且品赏式烹饮越来越流行。而“丝路少年”在寺院内外都能看到戴平头巾、剑舞走绳、弄丸击球、角抵幻术等诸般伎艺杂耍，长安城内这类表演在各个坊里公共场所轮番上演，吸引了无数的市民百姓。

在第三场景中，长安的郊游与贵族甲冑的狩猎蔚然成风，展览紧扣“游”与“猎”，分头介绍唐代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普遍崇尚狩猎活动。不仅有王室贵族阵容庞大的狩猎团队，还有骑马驰骋的女性参与射箭活动，特别精彩的是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八件彩绘狩猎陶俑，为抱猎犬、架猎鹰、置猎豹、带猎狗、驱鹿等形象，其胡人满脸须髯、身材强壮，他们实际就是以“猎师”身份陪伴主人狩猎的扈从，这些扈从大多是和助猎动物一起入华的胡人，他们受过调教猎兽猛禽的训练，是专业的驯猎师。这个场景中还配合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展出了梳着双垂髻、乌蛮髻、倭堕髻、偏髻的各种姿态女立俑，从而使人们从静默的文物中，看得见人间的温度，这也是展览场景最吸引人的地方。

第四场景则以“长安厩”为核心来表现“宅”与“器”，在这些住宅里既有高门甲第的达官贵人，也有普通瓦房里的文人志士，还有流寓长安的域外人士。这个场景展出唐三彩里坊院落模型，房屋前和院落中还站立着若干人偶，表示人丁兴旺，家有富裕。展线上的方口水井、绿釉陶磨、褐釉踏碓、小巧假山等等，似乎衬托着当时人们家庭生活丰衣足食的追求以及满足。家具上的银合页、八棱形银锁等生活中小用具，愈发彰显着“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的意境。金银器皿是唐代手工业制造的高峰，甚至在银壶上就有“大唐”款二字。陈列金银器中的海棠形黄鹌花鸟银杯、鎏金海棠形托

「丝路少年」的长安乡愁

——《长安有故里——丝路少年大唐行》序言 葛承雍



年问“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少年皆有胡心矣”。长安无疑会对少年胡人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会塑造他“由胡入汉”的性格与人生轨迹，也会决定他在唐朝流连忘返的“乡愁”。

千秋沧桑兴亡事，星辰坠落无数人。正如展览序言里演绎的“长安梦”所说，当丝绸之路上的蓝衣少年久居长安变成“蓝衣老人”时，他回顾自己初入长安那种直击心底的震撼，曾经是商铺连串、百工群聚，文人诗吟、艺术璀璨，胡风盛行、百戏喧腾，千门万户、四通八达，俯拾即是机遇。几十年沉醉在京畿长安，已不知何处是故乡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但有了新故乡又不幸遭遇人为的失去，那是一种双重的失去。在历史狂飙袭击下，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长安曾几次被破环摧残，让人心痛不已，特别是战乱使以长安为故乡的每个人都在沦陷，这种冲撞还能引起他们对故乡的思愁吗？

用文物结合史学、艺术展出长安的风貌，原来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就是用文物艺术到处去寻觅消逝的家园和被遗忘的祖先。不让久别变成永别，不让无数诗人文士天籟般的声音永远消失，不让生活在陕西的人与外来的人有隔膜，所以展览非常及时。当一个“丝路少年”的异域形象奔驰在长安大地时，有着一一种超越故乡的心理。

看完展览很多人以为长安代表汉唐盛世的辉煌、财富、美女，其实真正代表的是知识、智慧、艺术，是文明而非野蛮，不是一味对欲望的追求。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两个长安，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在天上的代表了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信仰、智慧、幸福创造力和佛祖的追求，地上的长安代表了历史、文化和传统。

城市和人一样，都有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记忆，那些带有坐标性的记忆符号渐渐被时光湮没，只有文物还在城市毁灭后顽强地存在着。回眸千年历史沧桑，在怀旧的氛围中有一种久违的心灵感动，跨越时空的文物，依然能让观者感受到一种历久弥新的活力，让爱这座城市的人们充满感动。如今在这片土地上，城脉、文脉、人脉、人脉、血脉、血脉、千载不歇，生生不息。近年来《长安十二时辰》《长安三万里》等虚构艺术编刷热闹纷呈，吸引着海内外游客在西安古城纷纷寻找“打卡点”，仿佛吸引他们的是是一座充满历史故事和传奇的露天大展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座城市遗存下的文化内涵，是一座古都的传承与记载的历史。

从交流的角度来说，长安这座“不靠海、不沿江、不沿边”的西北最大内陆城市，依托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优势，从“孤赏”走向“共赏”，彰显千年古都的“国际范”，作为一张城市文化交流的新名片，再次以崭新的姿态站在众多国际城市的面前。丝绸之路以其连接的文明形态之多，跨越历史时期之长而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而无数个“丝路少年”所构成胡汉相融展览主线也将大留人心。

（本文摘自《长安有故里——丝路少年大唐行》序言部分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长安有故里——丝路少年大唐行》

编：西安博物院
主编：朱敬敏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修订版）后记

张晓梧

我曾经在张忠培先生所著《中国考古学：永远在路上》的后记中写道：“父亲的学术思想还需要在之后和以后的出书中逐步体现。”之后，我参与了张先生所著《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一书的再版工作，期间我一直在思考自己还能将张先生学术思想的传承再做点什么？我想到了《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这本书。

张先生所著《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初版于2005年，它是中国考古学重要的教材和参考书，虽然早已过了版权期，但有修订和再版的必要。三年的新冠疫情对企业影响很大，作为出版企业的文物出版社尤其如此。我不愿意再给出版社添麻烦，但又不能失礼节，于是我打电话给这本书的编辑蔡敏先生，说：“这本书已过版权期了，我和您打个招呼，要拿出来……”蔡敏打断我的话，“我上楼找你。”我和蔡敏谈了半个小时，达成了在文物出版社再版这本书的意向。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发展期，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关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以及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走向等重大问题在考古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这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张先生择选自己的部分著述，集结出版了《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一书，是为了向读者介绍“我于中国这最重要的十年中在考古学方面的认识转化”。这些认识是张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所遇到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讨论，又是张先生面对新思潮与中国考古学传统和如何尊重传统又突破传统诸问题的检视和探讨。

本书初版后，张先生曾修订过；本书的再版，我们在张先生修订的基础上，增加一篇《写在〈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前面的话》，并邀请朱延平先生为本书学术把关。朱延平学业严谨，这次朱先生负责本书的修订和校补工作。

除《古国文明灿烂辉煌》和《写在〈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前面的话》外，《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修订本）收录的论著仍分为四组：一组计有10篇，主要是对中国考古学的回顾与前瞻，以及对传入国内的国外考古学思潮、夏商周断代工程、聚落考



古、考古学与文物保护和考古学持续发展等重要问题的认识；二组共14篇，基本上是在讲考古学文化分期、序列与谱系，涉及的年代为史前和夏、商、周三代，地域则是黄河流域、淮河流域、白山黑水和长城地带；三组收录4篇，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张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与社会性质的基本认识；四组仅3篇，基本上是谈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修订版）一书评析了典型事件和张先生的心路历程，核心解读了“中国考古学要做什么路，扛什么旗”的考古大课题。换言之，经过风风雨雨的中国考古学是怎样闯荡出来的？是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的前方是哪条路？张先生在这本书中都一一作了解答。这本书文字表述精准，有较强的可读性，即使非专业的读者，也可得循着考古学思想的脉络，追踪当代中国考古学的种种问题，获得思考的趣味。

最后要感谢曾经为此书出版做过贡献的于可可女士、朱延平、郭瑞海、任亚珊、许永杰先生，蔡敏先生，以及本书修订、再版编辑、张先生的湖南小老乡黄曲女士和新人职编辑蔡睿佳。

《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修订版）出版时值张先生九十年诞辰之际，这是对张忠培先生的最大怀念和告慰。

《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修订版）

作者：张忠培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6月